

# 儒家生活世界

基于生活世界概念的新诠释 重绘梁漱溟儒学的新面貌



顾红亮〇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儒家生活世界

顾红亮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家生活世界/顾红亮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ISBN 978 - 7 - 208 - 13608 - 3

I. ①儒… II. ①顾… III. ①儒家-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6477 号

责任编辑 鲍 静

装帧设计 零创意文化

**儒家生活世界**

顾红亮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http://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25×880 1/16 印张 18 插页 4 字数 217,000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3608 - 3/B · 1162

定价 58.00 元

# 我对此书的一点理解

——《儒家生活世界》读后

梁培宽

2013年下半年的某一天，顾红亮教授和美国女学者林琪教授来访。在此之前，我收到了顾教授寄赠的其所著《儒家生活世界》一书，并粗读了一遍。他们二位想从此书入手，对先父梁漱溟思想的研究问题交换意见。

可是我只是退休后，廿多年从事先父著述的整理编辑和出版工作，对先父著述内容仅略知一些而已，这当然不算什么研究。何况自己学的是理科（生物学），对文史哲方面生疏得很，学识如此浅陋，只能谈谈一些感想罢了。

多年前，我即注意到先父的这样一句话：“但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见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最末一页）如此强调孔子的东西是“一种生活”，是什么用意？真是十分耐人寻味！此外，先父在此书的“自序”中，提到自己“决定搁置向来要做佛家生活的念头，而来做孔家的生活”。并且倡导大家去“做孔家生活”。

在读了《儒家生活世界》之后，才知道著者是在研究先父所著《乡村建设理论》。在“自序”中，先父说过：“我自己的性情不许我没有为我的生活作主的思想。”根据此话，可以理解生活要有为它做主的东西，那就是思想；是思想主导着生活，也可以说它引领着生活的走向。按我

粗浅的理解，《儒家生活世界》一书就是研究那主导着并决定其内容的那儒家生活世界的思想（理论）。

如此书著者所说：“梁漱溟本人并没有对儒家生活世界的理论作出系统的阐述，……他的叙述散落于各种著述文章之中。”现在在此书里看到，经过著者的梳理和研究，完成了“对梁漱溟哲学思想的重构”工作，使梁漱溟的“儒家生活世界”的理论系统化了，也深化了。

对我个人而言，这对理解“乡建”的理论与实践有许多帮助，也有不少启发。看《乡村建设理论》，又看《儒家生活世界》，如此二者对照着看，这是一可取的方法。这自然是将它系统化带来的好处。

说老实话，《儒家生活世界》一书，有不少章节我还没有读懂，有不少专门名词对我也是完全陌生的。我只从总体上对此书说出一些感想而已。说得不对的地方肯定少不了。

听说此书将再版，著者希望我为再版的此书写几句话，于是就涂写了如上的这些，供补白吧。

梁培宽

2015年7月21日

涂于北大承泽园

## 第一章 儒家生活世界概念

- 一、人生问题与“五四”启蒙 /006
- 二、社会问题与乡村生活 /016
- 三、西方哲学视野中的生活世界 /035
- 四、儒家生活世界的维度 /043

## 第二章 礼俗生活世界

- 一、社会构造与礼俗秩序 /056
- 二、儒家礼俗的内涵 /070
- 三、乡约世界的改造 /075
- 四、讲学风气的再创 /083
- 五、作为生活智慧的礼俗 /108

## 第三章 政治生活世界

- 一、儒家民主观与杜威 /116
- 二、权利观与权利的个人 /128
- 三、现代政治神话批判 /138
- 四、新政治习惯 /156

## 第四章 心性生活世界

- 一、从直觉到“理性” /165
- 二、从意欲到生命 /185
- 三、对待科学的双重姿态 /213
- 四、以道德代宗教 /233

## 第五章 儒家现代性

- 一、儒家生活世界理论的矛盾 /246
- 二、对现代性和儒家的双重反思 /254
- 三、犹太生活世界的重整与启示 /262

参考文献 /271

后记 /278

The  
Confucian  
Life-world

第一章  
儒家生活世界概念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是现代中国哲学史上有原创思想的哲学家，被列为现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思想评价不一。

有的评价着眼于儒家传统与梁漱溟的关系。梁漱溟被周策纵称为“第一个在理论上系统地捍卫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的人”<sup>①</sup>。很多学者认为梁漱溟的哲学思想继承陆王学派的思想，冯友兰认为，这种继承是指“接着”陆王讲，而不是指“照着”陆王讲，<sup>②</sup>而且他给孔子思想做了一个全新的解释。梁漱溟还被美国学者艾恺（Guy S. Alitto）称为“最后的儒家”，被吴江称为新儒家事功主义者<sup>③</sup>，而梁漱溟自己则希望别人称

---

<sup>①</sup>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3页。

<sup>②</sup> 参见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

<sup>③</sup> 参见吴江：《新儒家事功主义者梁漱溟》，见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6页。

他为“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sup>①</sup>。晚年的梁漱溟自称他是一个佛教徒。<sup>②</sup>在和梁漱溟的面谈之后，艾恺又说：“我相信梁漱溟一生无疑在某一层意识上确实一直维持着他的佛教信仰，就像他以前那些历史上的宋明理学家们一样。”<sup>③</sup>

有的评价着眼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梁漱溟的关系。冯友兰把梁漱溟归为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与左翼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并列，并称他的思想是新文化的一部分，不是旧文化。<sup>④</sup>郭湛波说梁漱溟反对科学与民主政治，他的思想“仍是中国农业宗法封建社会的思想”<sup>⑤</sup>。陈来说梁漱溟“不是反对科学民主，而是始终称扬德先生和赛先生；不是代表农业宗法封建思想，而是主张生产社会化的社会主义”<sup>⑥</sup>。

有的评价着眼于西方哲学与梁漱溟的关系。王宗昱指出，梁漱溟是“中国第一个吸收柏格森哲学并以其重新解释唯识佛学和儒学心性学说的哲学家”，而且他对柏格森（Henri Bergson）哲学的吸收前后有所不同。<sup>⑦</sup>有的学者认为梁漱溟的哲学与海德格尔的哲学有一定的亲和性。<sup>⑧</sup>

有人说梁漱溟是保守主义者，艾恺说梁漱溟是“文化守成主义者”和反现代化的人，也有人说得比较缓和一些，认为梁漱溟在批判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表现出文化守成的倾向，“这种守成倾向在日后使梁漱溟的文化观向着保守主义发展”<sup>⑨</sup>。晚年梁漱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他并不保守。

<sup>①</sup>《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sup>②</sup>参见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336页。

<sup>③</sup>艾恺：《最后的儒家》，王宗昱、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页。

<sup>④</sup>参见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1—82页。

<sup>⑤</sup>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页。

<sup>⑥</sup>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sup>⑦</sup>参见王宗昱：《梁漱溟》，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版，第301页。

<sup>⑧</sup>参见郭齐勇、龚建平：《梁漱溟哲学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6页。

<sup>⑨</sup>王宗昱：《梁漱溟》，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版，第109页。

有学者称梁漱溟的哲学“主要是一种文化哲学”<sup>①</sup>，也有的学者称他的哲学是文化哲学、生命哲学和人生哲学。<sup>②</sup>有学者指出梁漱溟的思想具有某种民粹主义的性质。<sup>③</sup>也有学者称梁漱溟的儒学是“民粹主义的儒学”<sup>④</sup>。牟宗三说梁漱溟为人有性情，也有思考力，但是，“在想以到乡下做‘教主’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这一点上，遂使他的生命走不上正当的途径。他接不上儒家内圣外王的弘规，他并把握不住中国历史文化的大动脉”<sup>⑤</sup>。另有学者说，“若以一位思想家来论，梁先生似乎还不够格”<sup>⑥</sup>。

不过，大多评价都充分肯定梁漱溟哲学的原创性。可以说，这些不同的评价给梁漱溟哲学平添了几分“魅力”。无论如何，他的哲学作为现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类型值得深入研究。

在现有的梁漱溟哲学研究中，有很好的研究成果，前面的介绍已经表明这一点。不过，哲学的诠释是开放的，梁漱溟的哲学可以在新的视域中得到重新诠释与定位，从而呈现其独特的思想魅力。生活世界理论便是这样一个新的视域。它将成为我们切入梁漱溟哲学研究的一个理论视界。在此视界的观照下，梁漱溟因此成为现当代中国哲学史上较系统阐释儒家生活世界观念并付诸实践的哲学家。

这样，本项研究的焦点在于诠释与重构梁漱溟的儒家生活世界理论，而不在于全面评估梁漱溟哲学。

<sup>①</sup> 柴文华：《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61页。

<sup>②</sup> 参见郭齐勇、龚建平：《梁漱溟哲学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sup>③</sup> 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页；Catherine Lynch: Liang Shuming and the Populist Alternative in China (Unpublished),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Populist and China.

<sup>④</sup> 卜问天：《民粹主义的儒学体现者》，见梁培宽编：《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sup>⑤</sup> 牟宗三：《寂寞中的独体》，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页。

<sup>⑥</sup> 谭宇权：《梁漱溟学说评论》，文津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 一、人生问题与“五四”启蒙

在进入本节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梁漱溟的思想方法。把握他的思想方法，更易于了解其思想形成的轨迹和焦点。

梁漱溟不是哲学专业或历史专业训练出来的，不是职业哲学家，可以说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哲学家。金岳霖所说的现代职业哲学家的弊病（如“他懂哲学，却不用哲学”<sup>①</sup>）在梁漱溟身上是很难觅得的。梁漱溟在《我的自学小史》一书里叙述了早年的学习经历。在该书的序言里，他说：“我想我的一生正是一自学的极好实例。……象〔像〕我这样，以一个中学生而后来任大学讲席者，固然多半出于自学。”<sup>②</sup>自学带给他的一个好处是较少受到理论框框的束缚，按自己的兴趣去自由学习，发现问题。

梁漱溟喜欢学习，既从书本上学习，又从社会中、生活中学习。他更喜欢提问，他的问题大多来自社会生活经验或个人生活经验，而不是来自理论本身，不是来自逻辑推演。“我还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者，而大抵为了解决生活中亲切实际底问题而求知。”<sup>③</sup>他的问题一定是他思想上的困惑，是让他苦恼和烦神的问题。在没有解决它之前，它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他也就一直用心思。这样的问题既是个人的问题，也是时代的问题或民族的问题。“我是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从而根追到其历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寻个明白。……其中有整个生命在，并非偏于头脑一面之活动；其中有整整四十年生活体

<sup>①</sup> 金岳霖：《道、自然与人》，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9页。

<sup>②</sup> 《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61页。

<sup>③</sup> 《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62页。

验在，并不是一些空名词假概念。”<sup>①</sup> 即使是时代的问题或民族的问题，也是他自身体验出来的问题，是从他的生活经验中涌现出来的问题。因此，他的问题不是冷冰冰的理论问题，而是饱含切肤之痛的理论问题。在他的眼里，理论问题也即实践问题。

对于新出现的问题，不仅要加以认识，把握其实质，而且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力求解决。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的体例安排上贯彻了这样的思想。此书分甲部和乙部，甲部指认识问题，乙部指解决问题。甲部和乙部的结合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系统思考。

可见，梁漱溟的思想方法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注重问题意识。正是问题的更替变化，推动着他的哲学的发展。因此，解读梁漱溟哲学的关键之一在于抓住他的问题意识。

当我们试图重新理解梁漱溟哲学思想的时候，一个不得不考虑的话题是梁漱溟哲学的首要问题是什么，他到底关心什么样的哲学问题或时代问题。

还是让我们来听听梁漱溟自己是怎么说的。梁漱溟说：

我一生啊占据我自己头脑的有两大问题，一个是中国问题，是现实的中国国家的问题、社会问题。国家问题就是中国的衰弱危亡、社会的苦痛，这是常常地占据我的头脑的一个问题。可是另外一个问题远远超过、大过这个问题，就是对人生问题的怀疑烦闷，以至于对人生的否定。<sup>②</sup>

在他思考的这两个问题中，人生问题“远远超过、大过”中国社

<sup>①</sup> 《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sup>②</sup> 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305—306页。

会的问题，或者说“人生问题较之当前中国问题远为广泛、根本、深澈”<sup>①</sup>。其实，合起来讲，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的人生问题与中国民族、社会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但相对而言，他更关心人生问题。他的这种关心既与个人的经历有关，也与时代主题有关。

梁漱溟早年的个人经历并不复杂，但其人生思想却是一波三折，大致可分三期。人生思想的第一期发生在十四五岁到 19 岁（1912 年）之间，受其父亲的影响，信奉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认为人生便是要避苦求乐，寻求现世幸福。人生思想的第二期发生在 1911 年到 1920 年之间，他信奉佛家，推崇出世思想，有出家的念头。他认为人生的苦乐不在于外部环境，而在于主观心境。人生之苦起于欲望。人生思想的第三期，发生在 1920 年以后，他由佛家思想转入儒家思想一路。他认识到《论语》的精义在讲乐，“全部《论语》都贯串着一种和乐的人生观——一种谨慎地乐观态度”<sup>②</sup>。“孔颜乐处”是真正值得追寻的人生之境。

少年、青年时代的梁漱溟一直很执著于人生问题的思考，寻求人生的意义。直到发现儒家思想的价值，才确立自己的人生观。可见，人生问题的烦闷是早年梁漱溟个人的“困惑”。

从时代主题上看，人生伦理问题不仅是梁漱溟个人的烦闷，也是“五四”时代青年的烦闷。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作《吾人最后之觉悟》（1916 年），表达了“五四”主流思想家的启蒙立场。陈独秀说：“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

<sup>①</sup>《梁漱溟全集》第 3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 页。

<sup>②</sup>《梁漱溟全集》第 7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85 页。

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sup>①</sup>陈独秀把近代以来的中国人的“觉悟”史分为三段，即学术的、政治的和伦理的觉悟，其中伦理的觉悟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主流意识，通常也被认作“五四”启蒙的主要内容。在当时陈独秀眼里，伦理的觉悟是启蒙的关键，而不仅仅是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的理性的运用。如果把觉悟当作动词来理解，觉悟（认识）也许与理性的运用有关。但是从觉悟的内容来看，陈独秀强调的是伦理与道德上的更新，他希望破除礼教与不合时宜的儒家伦理观念，树立现代伦理道德意识。在此启蒙观念的背后，蕴藏着一个基本的预设：通过伦理道德观念的变革进而改造个人与社会。这是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启蒙预设。

上述预设不同于有的海外学者提出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该途径坚持这样的信念：“文化改革为其它〔他〕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础。进一步设想，实现文化改革——符号、价值和信仰体系的改革——的最好途径是改变人的思想，改变人对宇宙和人生现实所持的整个观点，以及改变对宇宙和人生现实之间的关系所持的全部概念，即改变人的世界观。”<sup>②</sup>该信念表达的是一个宏大的叙事，大概可用于描述大多数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因为，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理由在于：这是一群倚重思想、知识来解决现实问题的人。“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一个普遍的说法，但此说法并未凸显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特征。相反，不是宽泛意义上的思想改革而是陈独秀所说的“伦理的觉悟”深刻地道出了新文化运动初期知识分子的启蒙心态。

<sup>①</sup>《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sup>②</sup>[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4页。

上述伦理觉悟的启蒙预设几乎成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共识。因此，在“五四”前后，思想家讨论人生哲学、人生观问题成为时髦，“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五四”前后在中国的思想界出现那么多的人生哲学著作。朱谦之端出唯情主义的人生观，吴宓提出人文主义的人生观，李石岑和梁漱溟提出有意志主义色彩的人生哲学，胡适提出自然主义的人生观，鲁迅批判阿Q式的人生观，这些人生观（或人生观批判）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陈独秀的伦理启蒙观念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必须改造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念。这种心声一直回荡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心中。传统儒家十分强调在个人发展和社会改造中伦理道德的核心作用。尽管启蒙思想家提出了批孔的任务，但在思维方式上，仍然受到儒家思想的限制。

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批评中国社会的人吃人现象，这种现象是与儒家伦理道德联系在一起的。他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sup>①</sup>如果说中国历史是一本书，书上写的是仁义道德，但它的背后隐藏着深意，这个仁义道德是吃人的道德。“吃人”可理解为对人的自主性的扼杀，传统儒家道德规范的负面作用由此可见一斑。鲁迅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以《狂人日记》响应了“五四”青年提出的伦理觉悟的号召，他认为必须改变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改变国民精神，文艺是达到这种改变的有效手段之一。

美国学者费侠莉（Charlotte Furth）指出：“新文化运动的设想，哺育了现代中国思想中那个连绵不断的组成部分——把唤醒中国人的觉悟，

---

<sup>①</sup>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7页。